

论争与反思——对我国高等教育“前大众化”阶段的思考^y

王建华 邬大光

摘要: 大众化理论是近年来传入我国的一种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其大致是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以上、50%以上为两个转折点。在15%以下为精英阶段,15%~50%之间为大众化阶段,而50%以上则为普及化阶段。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开始走向大众化,但问题很多,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认真反思我国高等教育在前大众化阶段,也就是近20年来,在发展规模与速度上的论争,总结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速度上的成败得失,也许对我国高等教育成功实现大众化会有所启发。

关键词: 前大众化; 发展规模; 论争与反思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10(2003)01-0048-05

Argument and Reflection

——A Study on the Pro-mass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Wang Jianhua Wu Daguang

Abstract: The theory of massification is a new theory about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recently. Now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begins to make for massification from elite stage, but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during this course. In this situation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recent 20 years, summing up some experiences about the development scale and velocity, which is important and illuminat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to make one's own way in China.

Key words: pro-mas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al scale; argument and reflection

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20年论争的历史及各派观点概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以后,我国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获得了新生。1982年我国普通高校为715所,1983年上升为805所,1984年为902所,1985年为1016所(不包括各省所属的职业大学),平均每年递增近百所。面对高等教育如此迅猛的发展势头,论争由此开始。时任原国家教育规划办公室主任的周贝隆在《高等教育未来与发展》(京)1986年第1期上发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需求限止效益对策》一文。文章指出“教育规模的发展首先是基础教育,其次才是高等教育”;而且强调“我国基础教育薄弱,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建立在巩固的基础教育之上”。接着一位署名焕章的学者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上也发表了《试论我国高等教育的膨胀——对教育改革与发展中若干问题的思考》,表示赞同“周”的观点。不同的声音也有,1988年《高等教育研究》第3期上便刊出了袁连生的文章《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是否速度太快、规模过大?》。文章认为“我

国高等教育不能缩小规模,而要在改革中发展,到90年代还要保持适当的加速度发展,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相反,1989年《高等教育研究》(武汉)和《中国高等教育》(京)都在第二期上分别刊载了杨雄的《也谈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兼与袁连生同志商榷》和徐敦演的《谈严格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问题》。当时论争的文章还有很多,仅举几例便可见论争的“盛况”。

作为论争的结果,我国高等教育在80年代前期的增长势头被人为抑制,而且还在1986年和1989年出现了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负增长。但“象其他社会体系一样,一旦高等教育在原有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形成规模,其规模的惯性在短期内是难以克服和消除的”。^[1]结果在1989年负增长的基础上,全国高校招生人数还是从1992年的74.3万人增加到了1993年的92.4万人,年增长率为24.36%;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也从1992年的217.3万人增加到1993年的253.6万人,年增长率为16.7%。1994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到200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数达到630万人左右,其中本科生180万,专科生450万,18~21岁学龄人口入学率上升到8%左右的高教发展规划。而实际上

^y 收稿日期:2002-10-08

作者简介:王建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邬大光,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

361005。

1991年全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生数已达583.9万人,占18~21岁人口的8.3%。^[2]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中国的高等教育今后应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展开了讨论。1996年周贝隆在《高等教育研究》(武汉)第2期上发表了《高教发展规模的战略选择》一文,明确地提出了高等人才培养的“宁紧勿松”原则,并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应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是2:3”。与之相反,1997年温松岩在《高等教育研究》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问题的几点思考》,文章认为“有过剩才能有竞争”;通过“一定程度的人才过剩还能改变一些毕业生自视过高的想法,使大部分高层次人才自愿流动到更需要他们的基层岗位上去”,并主张“通过多种形式办学和筹措资金的方法来积极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与之相应,郭锋也在《高等教育研究》(武汉)1997年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和速度的思考》,郭锋通过分析认为“17年(1980~1997,笔者注)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速度并不快,总体上说低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还远不能满足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998年伴随着大众化的热点讨论,有关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的论争再次达到高峰。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上海高教研究》1998年第8期上发表了《高等教育适度发展,还是大力发展?》,全文有理有据,从八个方面周密而详尽地论证了“应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并提出“分三步走”,力争在2010年或稍后,使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达到甚至超过下中等收入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即27%的水平。“何文”可谓石破天惊一下子使论争的焦点发生了转移,人们开始关注是大力发展或是适度发展而不再去讨论要不要发展了。1999年普通高校计划招生达153万以上,与1998年的108万人相比增幅达44%,实际招生增幅高达47.8%,致使该年度的高考生的录取率达到58%左右。^[3]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在90年代有关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论争中“促进派”占优势不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90年代有关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论争中,人们的视野较之80年代已明显放宽,超出了“就事论事”的局限,开始涉及到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相关问题的研究。如,闵维方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办学效益研究》,潘力的《论我国高等教育的周期性波动》,房剑森的《论我国高等教育的补偿性增长》,叶平的《关于进行高等教育规模增长速度预警研究的探讨》,以及叶文梓的《论高等教育的增长方式》等等。这些文章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这一问题的认识已日渐深入。各派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 大力发展论。该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三个因素作为其理论的背景:新技术革命对高级人才的巨大需求;经济建设首次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经济要大发展;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中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长期停滞和萎缩。其理论来源是“人力资本论”、“知识经济论”、和“社会需求理论”。^[4]其代表人物是何祚庥。根据“何”的大力发展理论,其战略目标是:“第一步自1999年起进一步增加高等学校尤其是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并逐年提高,力争用5年的时间,即到2003年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18%(UNESCO口径14%)左右。在1998年的基础上翻一翻,其年均增长不低于14%。第二步到2005年将毛入学率提高22%(UNESCO口径18%)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即年均增长11%

左右。第三步在此基础上再用5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即到2010年或稍后将毛入学率提高到34%(UNESCO口径27%)以上达到甚至超过下中等收入国家中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即年均增长9%或略低。”^[5]

(二) 严格控制论。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整个80年代,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规模控制论都一直占据着上风。这里除大力发展论有超越国情国力之嫌外,控制派代表人物周贝隆的参预论争恐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从1986年开始,周贝隆先后发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需求 限止 效益 对策》,《关于我国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问题》,《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战略选择》。在这一系列论述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文章里面,“周”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即“我国的高等教育的规模不算小”;而且“从经济实力看,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苏、日相比还有几倍的差距,但高教规模已超过日本(240万人1984)比苏联略低(515万人1985),在世界上也算名列前茅了。”^[6]同时他还提出“以经济实力衡量,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经济的需求,应控制发展的速度,压缩规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7]

(三) 适度发展论。持该论点的人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低于初、中等教育,发展的速度落后于世界各国”;“我国教育总体(以入学率计算)略超前于经济发展,小学教育尤其超前,中等教育基本持平,唯独高等教育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整个教育发展水平不协调。以规模而言,我国教育中最薄弱的环节是高等教育”,^[8]因此在高等教育规模上首先是“发展”而不是“控制”。同时又由于经济的原因以及我国高校的现有状况,还不具备“大力发展”的条件而只能“适度发展”。

总体来看,80年代初大力发展论曾占主导,高等教育规模在短期内出现了非常规扩张。由于国情国力的缘故,更主要的是因与决策者的观点不一致,大力发展论很快便为严格控制论所代替,并且还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政策,影响到整个90年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其间尽管有人提出“适度发展论”来表示对严格控制论的异议,但由于严格控制的惯性已经形成,适度发展论也未能给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更多的生机。相反,作为一种折衷的观点,易为人们接受,从而使高等教育自身扩张的冲动受到了“麻痹”(或说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从表面看好像是在适度发展,而实质上走的仍是严格控制发展的路子,只不过更隐蔽了)。可以说,在1999年以前,整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一直没能走出严格控制论的理论阴影。

二、对传统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

在20世纪80~90年代20年时间里,我国高等教育错过了许多发展的机遇,其原因一个是传统高等教育规模研究方法的不科学;其二是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决策理论不成熟。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主要论述第一个原因。

“涉及高等教育规模的研究是从60年代开始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五种研究方法:人力需求法、国际比较法、成本收益法、社会需求法以及社会-劳力配合法”。^[9]

(一) 人力需求法。人力需求法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

据,通过对计划期内受过教育的各级各类的现有储备、离职与流动的人才数的计算,从而得出所需附加人才数,最后根据计划内每年的附加人才数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毕业生数,从而确定每年各级各类学校的招生数,包括高等教育的招生数。不可否认,人力资本理论对揭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贡献,但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许远比人力资本理论所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人力资本理论明显有夸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促进作用的趋势。

(二) 国际比较法。这是继人力需求法之后首先出现的又一种研究高等教育规模的方法。其倡导者是哈比逊和梅尔斯,其实质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在高等教育规模研究上的具体运用。具体做法是综合考察各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或说是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运用数学方法算出它们之间的相关,在证明其相关显著以后,便可以认为这一结果对“本国”有借鉴意义。由此在仔细权衡“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或经济发展阶段后,便可参照“他国”的做法来制定“本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这一方法的运用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理论依据。我国在近20年的有关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论争中,这一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由于指标选取的不同以及参照系的差异,相同的数据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大力发展论或严格控制论或适度发展论),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该方法的不科学。

(三) 成本效益法。70年代随着汉森的《教育收入与人力资本》和沙查波勒的《教育收益》等著作的问世,以关注教育收益为宗旨的成本收益(内在利率)分析法渐占主流。该法认为,办教育应以效益为核心,优先发展收益率较高的教育层次和学种,其具体作法是将通常教育评估中已有的效益数据与成本数据结合,以确立一项成本收益比较,而且这种分析只能应用在有一共同目标的不同方案的评估;其主要缺陷是人们不能将不同的方案与不同的目标进行比较,人们也不能确定一项方案在其收益是否超越其成本这一角度来看其价值。就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而言,这一方法无疑是反对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相对于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而言,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是最低的。这也是周贝隆提出“效益应是教育战线一切活动的根据,也只有根据国力和效益来确定我国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10]的理论依据。

(四) 社会需求法。这种方法是近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所兴起的企图取代人力需求法的一种教育规划方法。“该法以教育机会均等,人人受教育,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目标,以个人和全社会受教育的需求为依据预测人口增长趋势,统计各年龄组的人口分布,确定各级教育系统的需求量,从而计算出教育经费的总量与构成”^[12]。客观而言,社会需求法是确定高等教育规模的理想方法,它考虑到了高等教育的非经济和非职业的文化目标和个人修养目标,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目前也只在一定的程度上适合于那些教育普及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毫无疑问,作为拥有世界上1/5人口的中国是不适用社会需求法的。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最近《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所讲“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去年高校招生大幅增加,但我国人口多,人人都上大学是不现实的”。但我们说社会需求法不适合中国国情并不是说在制定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政策时可以置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于不顾。相反,我国高等教育以前之所以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与政府通过

规定在校生人数来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在以后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政策时应适当多考虑一下社会或个人的需求是必要的。

(五) 社会-劳力配合法。20世纪70年代,西德经济学家维尔迈特把人力需求法与社会需求法相结合提出了社会-劳力配合法。由前面的介绍可知,人力需求法是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高等教育规划中比较符合其外部规律,但有夸大教育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倾向;而社会需求法是一种传统的结构分析方法,其是从所有受教育者(任何一个层次)都对经济增长有作用,而且都能达到充分就业这种假设出发的。维特迈尔将二者结合起来,企图通过“对学校系统劳动力的分析与预测和对社会需求劳动力的预测,从而使教育系统的供应与社会需求达到平衡,对教员、学校机构、设备和其他必要的财政经费的需求做出规划”^[12]从而确定高等教育的理想规模。不可否认他的原意是好的,即分别汲取人力需求法和社会需求法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但在实践中由于该方法操作起来过于复杂,若按此法来计算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往往具有较差的时效性,故此采用者较少。

仔细分析以上五种常见的有关高等教育规模的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其间有一规律,即大都通过定量的分析计算,得出一个量化的结果;也许正如周贝隆所说:“如果不建筑在定量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发展战略尽管可能表述的‘言之成理’鼓舞人心,最终难免流于空洞的口号或良好的愿望,经不起实践的检验。”^[13]

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研究方法的历史来考察,我们不可否认定量研究曾对做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决策起过重要的参考作用。但自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民主化浪潮兴起,影响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出现了许多难以量化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若再沿用以前的定量研究方法,并奉若“唯一科学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就目前而言,对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研究应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影响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因素,具体的数量问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完全可以在一定的区间内进行波动,其波动的幅度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一定的关系。

三、综合决定论:研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一种新思路

在国外,对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有不同的表述。美国高等教育家伯顿·克拉克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市场和学术权威(尤其是国家)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三种因素的大小便形成了各国不同的高等教育发展特点和模式。英国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在用他的“生态学原理”考察了近代以来的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后认为,市场(或求学者的要求)、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和大学的内在逻辑(传统)三种力量支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14]而日本学者天野郁夫则认为“高等教育数量发展的可能性是受阶级结构、教育结构和职业结构三者的关系所左右。”^[15]在国内,对于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通常的说法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人口等。

(一) 政治因素。政治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因素,政治事件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我国高等教育从49年建国至今经历了剧烈的波动,这与我国的政治气候及

各个决策者对高等教育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把握不无关系。”^[16]下表列出了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上的起伏与一些政治事件的对照关系（通过该表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历史轨迹）。

年份	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情况	主要政治事件
77~ 82	高校招生年均递增 7.7%	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
82~ 85	高校招生年均递增 25.3%	国务院批准《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
86~ 91	91年与85年的招生数持平,7年保持不变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控制招生
92~ 93	加快改革、积极发展,年均递增 22.1%	邓小平南巡强调“经济发展,教育科技先行”
94~ 98	94年比上年下降 2.6%以后低速增长	发布《关于贯彻〈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应走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道路
99~	99年招生增幅达 44%	国务院“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政策出台

另外,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胡鞍钢认为^[17]:我国经济增长波动的根源主要来自于政治因素和行政手段,每次经济扩张与历届党代会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高等教育规模增长速度的波动与此也有很大的关系。它主要是由党代会的第二年(或当年)召开的全国高教工作会议的决策来拉动高教规模的扩张。下表给出了自1983年起全国高教工作会议召开前后普通高校在校生的变动状况。^[18]

全国高教工作会议	召开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二次	1983	4.6%	15.7%	22.0%	10.4%	4.2%
第三次	1988	5.5%	0.8%	-0.9%	-0.9%	
第四次	1992	6.8%	16.1%	19.0%	19.0%	
均值		5.6%	10.9%	13.4%	6.3%	4.2%

(二) 经济因素。经济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高等教育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决定一个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在一定的条件下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我们不否认,经济发展水平或说是经济发展的阶段与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有一定的相关,在充分肯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起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仅围绕着经济指标(主要是GNP和GDP)进行反复测算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单因素的线性分析排斥了现实存在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其他因素有协调作用,以国民生产总值为相关指标并不能取代综合的相关指标。遗憾的是,在已有研究中并没有或少有考虑非经济的因素。其结果经济成了决定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唯一指标,经济功能成了高等教育的唯一功能,能否促进经济的发展成了是否应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唯一判定标准。不可否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对于初

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而言更为密切,但若认为高等教育仅是为经济服务的那就是大错特错。历史上曾有过“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今的高等教育竟又沦落到了仅为经济服务的地位,这是对高等教育规律与理想的背叛,也是长期以来一部分人反对高等教育扩张的理由。这样说不反对在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问题上进行经济分析,而认为一定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

(三) 高等教育自身的因素。这里有两层意思,从物质的层面讲,即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受其自身原有基础的影响与制约。比如高校师资的质与量,教学设施条件,招生容纳能力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等教育的数量发展速度和质量提高的速度。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就是不顾条件发展高等教育的一个教训。从观念层面讲,高等教育的理念也影响着高等教育自身的扩展。建国初期,我国的大学受前苏联有计划地培养干部和专家高等教育理念的影响,除一些人为的作用外,发展的内在动力一直不足。到了80年代“这一理念以及受这一理念支配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随着计划经济受到挑战而受到了冲击。”^[19]而后近20年来我国虽未形成具体的高等教育扩张理念,但一直不乏扩张的冲动。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我国民办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这也许就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被压抑的扩张冲动开始释放出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理念开始形成。

(四) 科技因素。“科学技术作为对高等教育具有强大影响的一种力量,其主要以思想观念和物质技术两种方式或直接或通过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传统的中介对高等教育施以作用。”^[20]20世纪中叶开始的科技革命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个国家无不是通过兴办高等教育来对科技的挑战做出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已面临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科技革命中大学既是科技的发源地又受到科技革命的直接影响,“可以说科技是近40年来高等教育迅速变化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21]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已初露端倪的21世纪,高等教育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将成为各个国家最为明智的选择。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要是近代大学是一座知识的动力站,那么一个国家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就是一个规模大了许多倍的智慧力量的中心。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存在着严重的教育不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相对于人口总数少之又少,科技创新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现在唯有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普遍提高国民素质,才能在21世纪借助“科技创新”这个杠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重要的是科技进步又可以反过来促进大学的发展,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五) 文化因素。有关文化与高等教育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兴起的,而仅就文化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之间关系的探讨还少见。据潘懋元教授和邬大光教授的研究,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无不发生影响,不仅反映在教育价值观和培养目标上,也渗透在教育体制,课程与教材、道德教育以及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中;从影响的方式看既

有来自社会意识、社会道德、社会舆论的影响也有来自文化心理结构方面的。

所谓文化心理结构是“一个民族历史地形成的生存条件和民族观念的文化在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中的凝结沉淀,是由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所塑造,陶冶而形成的共同的基本的人生态度、情感、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观念诸方面所组成的有机的总体结构。”^[22]由此可见,文化心理结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有机体,为了贴近时代,本文只能就其表层结构做一分析。文化心理结构的表层结构是指特定时代文化中的非理性的感情色彩较为强烈的某种意向,时尚或趣味层面,它的核心是社会心理。就目前而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可谓处在历史的顶峰。这是因为,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政治、经济条件都已基本具备,那种被压抑过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就变得异常强烈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国在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政策时就不应再一味地通过人为地控制在校生数量来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而应更多地考虑人们的社会心理需求。

(六) 人口因素。在我国,人们的传统观念里人口因素似乎对高等教育的规模影响不大,这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确定往往是一种“政府限定在校生人数的国家主义行为”,而不是根据大学适龄人口的多少来确定。笔者认为,在确定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时无视人口因素是绝对错的。正如宋健所说“数量和质量是统一的。只注意质量而不注意数量是片面的,我们现在应该想到这一点,改变这一点,不要等到后人写历史时再来总结。”^[23]

社会上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适龄人口过快增长就会极大地加重社会的经济负担,社会就不得不把教育经费压缩到较低限度。这种看法是一种静态的观点,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在我国现在的大学适龄人口多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若不根据适龄人口适当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而是人为地限止在校人数,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更何况从动态来看,教育对人口的增长率还有着较好的制约作用。我国1982年组织的28省、市、自治区千分之一人口出生率水平抽样资料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其生育率最低。故此,我国政府在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时应将大学适龄人口的状况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借教育这个“支点”走出“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

上文分析论述了政治、经济、高等教育自身、科技、文化、人口六因素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影响。这六个因素中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其目的就是指出单纯的经济分析的不足,提出“综合决定论”的观点,认为综合决定论应是我们研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一种新思路。

经济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起决定作用是从最终意义上讲的,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每一环节,每一具体事物上都是由经济因素决定。在某一定的时期,政治事件、高等教育理念、文化、科技、人口都可能表现出超越社会现实的经济水平强大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讲的,社会的发展是历史合力的结果,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应由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高等教育自身、科技、文化、人口等因素的合力来决定。

参考文献

- [1] [4] [8] [9] [11] [12] 樊安群. 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规模论 [M]. 南海出版公司, 1998: 7, 7, 10, 17, 23, 22
- [2] 转引自杨广云, 谢作栩.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探讨 [J]. 上海高教研究, 1997, (8).
- [3] 蔡永莲. 对“扩招”现象的深层原因分析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0, (1)
- [5] 何祚庥, 兰士斌. 高等教育适度发展, 还是大力发展? [J]. 上海高教研究, 1998, (7).
- [6] [13] 周贝隆.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国情需求规划对策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57.
- [7] [10] 国家教委发展研究中心编. 中国教育发展的宏观背景, 现状及展望 [C].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1990: 214
- [14] 潘懋元, 王伟廉. 高等教育学 [M].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7 (第二版). 104
- [15] 天野郁夫. 日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过程及其结构 [J]. 外国教育资料, 1989, (2).
- [16] 温松岩.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问题的几点思考 [J]. 高等教育研究, (沈阳) 1997, (6).
- [17] 胡鞍钢. 中国下一步 [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206.
- [18] 叶平. 关于进行高等教育规模增长速度预警研究的探讨 [J]. 高等教育研究, 1996, (6)
- [19] 张民选. 扩展高等教育的理念——半个多世纪的抉择 [J]. 高等教育研究, 1999, (4).
- [20] 睦依凡. 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J]. 上海高教研究, 1991, (4).
- [21] 胡建华, 等. 高等教育新论 [M].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121.
- [22] 刁培萼. 教育文化学 [M].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97.
- [23] 宋健. 人口与教育. 载瞿葆奎主编, 教育学文集·教育与社会发展 [M].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579.

(责任编辑 胡弼成)